



吴风吹东亚



中华文明对东亚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。仅以日本为例，便不光有徐福的传说，还有汉字传入的重大文明史实。而在我国对日“文化输出”的诸多案例里，江南文明的“存在感”是很强的。比如，有语言学家认为，相比于中国中原地区的“秦音”，来自中国长江以南尤其是江东地区的“吴音”，融入日语的程度或更深。此外，还有“吴服”“吴织”“吴染”——《日本国志》记载，5世纪时，天皇派使者往吴地求缝工女，得“吴织”四人而归。日语读红色染料为“吴染”，表明同时带去了染料与技术。江户时代称为“吴服”的服装样式，则与今天的和服相差无几。

还有江南文明对日本水稻文化的陶染作用。1982年日本吉野里考古发掘以来，弥生文化（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000年，填补了日本从原始文化迈入文明文化的文化断层）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。因更早的绳纹文化（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）不足以说明弥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水稻和铜铁器并存现象，所以，日本考古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猜想——江南文化是弥生文化的原乡！注意，猜想不是妄想，在弥生文化考古遗址中，发现了很多被认为是日本稻米文化起源的稻谷化石，经测定，这些稻谷化石的成分，与中国江南的稻米非常相像。综上，有日本史学家认为，日本稻米文化的导师，就是来自于中国的

江南文化。

日本人追慕汉唐。汉唐丝路沟通东西，明清两朝，以江浙为龙头的江南，又成了海上丝路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。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在谈到“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史”时即举例指出，乍浦自古就有“江浙门户”“海口重镇”之称，是清代浙江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，出入其间者除了商人、船员，还有知识人、漂流民等。在双方贸易品中，书籍和文房四宝占相当大的比重。据日本史家大庭修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》统计，从康熙五十三年至咸丰五年，经长崎港进口的汉籍多达6118种，共57240余册。有时一部中国新书刚刚问世，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，就被贩运到日本，很快被日本人训点、翻刻、摘抄等，广为流传。道光二十六年，沈筠编集的《乍浦集咏》，收入诗作“海不扬波俗不浇，迎龙桥接凤凰桥。东洋雕漆罗番市，南浦明珠烛绛霄。异域车书通日本，遐方琛赆驾秋潮”，充分反映了乍浦港与长崎港间繁华的通商场景，亦是书籍贸易盛况的写照。

喜欢中国的书，更尊重中国的学者。抗清失败后，明末浙江余姚思想家朱之瑜辞别故土，流亡日本；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请他到江户讲学，执弟子礼。不少日本著名学者也纷纷慕名从学，视其为“在日本的孔夫子”。朱棣格物穷理，摒弃空洞说教，议论政治改革，对日本综合国学和神道、倡导尊王和大义名分的水户学影响很大。还精通“农圃梓匠之事、衣冠器物

和风背后的江南文明。

